

# 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摘要]** 西北史地研究,是我国近代经世史学的重点关怀之一。作为清末民初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沈曾植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早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西北、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的开拓性探索上。其治学理念和方法,既透露出光绪间部分士大夫对边疆和外交危机的关怀,也反映了国内史学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研究展开交流互动的趋势,在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实具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

**[关键词]** 沈曾植 晚清 西北史地学 经世学术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14) 01-0041-13

沈曾植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海内通儒”,学识广博,举凡经史、诗文、音韵、目录、书法,乃至佛老内典无不涉略。至其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则在西北史地研究。对此,周清澍的《蒙古史学者沈曾植及其手迹》(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文曾有所评述,惜内容仍属对其论著的总体评介,而较少学术研究得失的具体举证和分析。本文将在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沈氏在该领域的贡献和治学方法作更为细化的考察。

西北史地学是清道光年间随着国势转衰和边疆危机加剧兴起的一门经世之学,其研究,初多集中于蒙元史和西北边疆地理,后渐扩及整个西部、西南边疆史地和中西交通史。沈曾植在这方面的学术活动,便包含了上述广阔的领域。

## 一、光绪朝蒙元史研究的倡行者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龠、寐叟等。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官至安徽提学使、署理安徽布政使。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清廷急遽衰落和外患日逼之际。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十岁的沈氏亦随家人由北京避难昌平,后有诗记其事云“青坂晓弃师,甘泉夕传烽。百里雷震惊,九天雾冥蒙。髫年识此境,播越军都东……噩梦印不忘,童心弱能容。”<sup>①</sup>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刺激,使他很早就开始关注时局和嘉道以来知识界兴起的经世之学,并对该派学者的遭际,深怀同情之心,曾谓“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往还常集于津要之途,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摒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蹶当时,士林所共记也。”<sup>②</sup>对于张穆等人关怀西北

**[收稿日期]** 2013-10-25

**[作者简介]**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① 沈曾植《题俞策臣先生画册》,《寐叟题跋》第二集,涵芬楼印本。

② 沈曾植《〈落颿楼文集〉序》,见《落颿楼文集》,吴兴刘氏嘉业堂1918年刊本。

史地研究,志在抵御外来侵略的用心,他尤为向往,自1875年起,就致力搜集张穆《蒙古游牧记》、沈垚《落颿楼文稿》、李兆洛《八排图》以及《元朝秘史》等,通过苦心研读,“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sup>①</sup>

1880年中进士后,沈氏长期任职刑部和总理衙门等部门,目击时艰,思想逐渐倾向改良。他不但政治上主张变法,还与京朝士大夫盛昱、文廷式、洪钧、李文田、袁昶等共倡蒙元史地研究,冀有补于朝廷外交及边务,在学术界形成了相当影响。

清中叶以来,蒙元史地研究日益蔚为风气,其研治风格,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因对旧《元史》不满,力主改写,代表人物为魏源、曾廉、柯劭忞、屠寄等;一则致力于蒙元文献的整理和具体史实考证,代表人物为钱大昕、汪辉祖、洪钧等。沈曾植便属后一路径,其这一时期对蒙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和《蒙古源流》等基本文献的校勘注释上。

《元朝秘史》(确切书名当作《蒙古秘史》)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古史文献,约成于13世纪上半叶,记蒙古族起源及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事迹。其书原用畏兀字蒙文写成,明初以汉字音译全文,旁注词义,并分段作汉文节译。后蒙文原本佚,仅汉字音译本存世,有《永乐大典》所收15卷本和经顾广圻抄校的12卷本,尤以后者价值为大。沈氏对此书一直十分关注,自谓“幼时读《潜研堂集》〈元秘史〉跋,恨无从得其书,寻知杨氏已刻入《连筠簃丛书》中,然全帙昂贵,无力置之也。”<sup>②</sup>后从厂市购得单行本,遂参校群书,续加笺注。其稿死后经张尔田、陶葆廉等整理,题为《元秘史补注》(15卷本),刊入《敬跻堂丛书》。<sup>③</sup>

《圣武亲征录》系元人据早期蒙文史料于忽必烈时代编译而成,叙事范围与《元朝秘史》相近,明修《元史》太祖、太宗本纪多取材于此。然译笔粗糙,乖舛颇多,长期未获流传。后经钱大昕等表彰,渐为人所重。光绪中,沈曾植与文廷式、李文田等从何秋涛家获其生前所校《圣武亲征录》稿本,互相商榷,续加校注,进一步推进了对该书的研究。沈氏晚年,又在沪上得一《说郭》本,重加校勘。其早年手校本虽因庚子事变,与“积年所搜集诸书留在京邸者并烬于拳焰”,<sup>④</sup>但校注成果仍有相当部分被保存下来。1894年,袁昶在芜湖首刊何校本《校正元亲征录》,将李文田、文廷式和沈曾植等“光绪朝士校语”同时录入其中。与此同时,广东顺德龙凤镗亦将李文田、沈曾植两人的校注刊入了《知服斋丛书》(署何秋涛校本,李文田、沈曾植校注)。该本载有李文田1893年9月一跋,称“顷同邑龙伯鸾(凤镗)主事来都应京兆试,欲乞沈子培刑曹校本刊之。沈校精细,迥出张(穆)、何(秋涛)之上,此书当遍行人间矣。”并自谓“一知半解,断不及沈校之精确,或亦有各明一义者,姑并寄伯鸾,以俟采择耳。”<sup>⑤</sup>而嘉兴博物馆保存的一通当年龙凤镗致沈氏函,亦确认了这一信息,函称“前承慨惠,大著俾鄙人录副刊入丛书,不胜忻幸。兹特奉恳乞早赐来,翘盼之至。”<sup>⑥</sup>王国维曾谓“桐庐袁氏刊何校本中附光绪朝士校语,杂出顺德李仲约(文田)侍郎、萍乡文道希(廷式)学士、嘉兴沈子培先生之手,今以无从识别,故混称某氏云。”<sup>⑦</sup>但若以袁昶刊本与知服斋本对照,便可知所谓“光绪朝士校语”,大多为沈氏所作。就知服斋本校注而言,其中标明为李文田校注者不过十余条,余皆出沈氏之手。至其晚年所校《说郭》本成果,据王国维说,“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

① 沈曾植《圣武亲征录校本跋》,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5页。

② 沈曾植《〈元秘史〉书后》,见《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1939年。

③ 钱仲联接“寐叟有《元秘史笺注》十五卷,闻曾由陶葆廉、孙德谦、张尔田三先生同校,未见其书,盖已佚矣。”(见《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5页)其实不然,此《元秘史笺注》当即《元秘史补注》。

④ 沈曾植《〈圣武亲征录〉校本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6页。

⑤ 见《知服斋丛书》第3集《校正元亲征录》。

⑥ 见《海日楼藏手翰集》真迹,嘉兴博物馆藏。

⑦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全集》卷11,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见。”<sup>①</sup>当已佚去。或以为“已刻入《知服斋丛书》中”，<sup>②</sup>然《知服斋丛书》为光绪间刊本，且龙凤镡本人卒于1909年，何以能将沈氏丁巳（1917年）所获之《说郭》本校勘成果纳入其中？其说显然不合理。

《蒙古源流》原名《汗等宝贝史纲》，为我国记载明代蒙古地区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萨囊彻辰，明末鄂尔多斯蒙古贵族，自称据《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等七种蒙、藏文史料写成此书。乾隆时先后译为满、汉文。由于其对蒙古早期历史的叙述，附会混杂着不少佛教传说，汉译本更存在着人名、地名表述不一和错译漏译等问题，以致“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于钩稽之术者不能通。象鞅之宾，苦于不知史，而治史者又以其难读而弃之”，<sup>③</sup>阅读十分不便。沈曾植以“嘉定钱先生（大昕）以来，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以及近时李（文田）、洪（钧）诸家，于《秘史》、《圣武亲征录》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独此书仅各就可资证佐者摘取断章，未有综其全书，而理董其绪者。”<sup>④</sup>遂于光绪间征引七十来种史地及佛教典籍，对其内容展开了校勘、疏证和注释。其留下的书稿，经张尔田整理增补，并加入王国维若干校语，题为《蒙古源流笺证》，于1932年刊行。是为我国第一部有关《蒙古源流》的校注。

沈曾植对以上三书的校勘，首先是在蒙文汉译的理解上纠正了前人不少误解。

如同时的李文田在《元朝秘史注》中仍沿顾广圻说，将该书蒙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误释为作者名，沈氏审度蒙文原意，最早在学术界提出了此当是蒙文书名，指出“‘忙豁仑’是蒙古，‘纽察脱察安’是秘史。颇疑‘脱卜’之言册，‘赤颜’即‘察安’之言史，《虞集传》谓‘国书脱卜赤颜’者，谓国书史册也。”<sup>⑤</sup>这一正确见解较王国维1926年《蒙文〈元朝秘史〉跋》中提出的“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蒙语“元朝秘史”之说要早了三十多年。又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述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大战于答兰版朱思之野，札木合败走。彼军初越二山，半途为七十二灶，烹狼为食”一句不得解，惟注“此下疑有脱文”。据《元朝秘史》所记，此战“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动，退著于斡难河哲列捏地面狭处屯札了。札木合于是回去，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又斫断捏兀歹察合安的头，马尾上拖着去了。”<sup>⑥</sup>显是札木合击败成吉思后，对属于敌方阵营的赤那思（即捏古思部）人施行的残酷惩罚。沈曾植细考文义，认为《圣武亲征录》如此表达，是误将“赤那思”读为“赤那因”之故，“读首卷‘孛端察儿无食’一条内，狼字蒙文并作‘赤那因’，乃知‘赤那因’是蒙文呼狼，而彼之地面又适名赤那思，译者莽卤改有此误，益知作此书人见蒙文秘史，未见译文秘史也。”从而使此处原义豁然明晰。并指出“此战太祖之兵大败，后得兀鲁兀惕、忙忽两部而后复振，此云札木合败走，非实录也。”<sup>⑦</sup>此外，对何校本《圣武亲征录》中尚存的人名地名错乱现象，也做了不少厘清。

在《蒙古源流笺证》中，沈氏不仅参照《元史》、《明史》、《元朝秘史》和《圣武亲征录》等书，对其其中的人名地名作了大量核对和纠正，还根据自己的满、蒙文知识，对某些汉译提出了看法。如卷三记成吉思汗“封博尔济（即《元朝秘史》之博尔术）为伊逊乌尔鲁克之长，九部落之诺延”，沈注云：“伊逊，九也；乌尔鲁克，部落也；诺延，官长也。下句即译上句意。”指出了文句的累赘。并认为汉译本出现的某些年代乖舛，当与转译不当有关。说“西藏纪年用支不用干，度此书原本亦当如未卷所谓‘九宫值年’云云，仅以十二宫纪年。译者不解十二宫法，悉易以甲子，因此纰漏百出，为此

①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王国维全集》卷11，第409页。

② 王遽常、钱仲联均持此说。见《沈寐叟年谱》及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按语（《文献》1991年第3期）。

③ 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序》，《蒙古源流笺证》，1932年沈氏《海日楼遗书》本。

④ 《蒙古源流笺证》卷1题首语。

⑤ 见《知服斋丛书》本《校正元亲征录》沈曾植注，光绪顺德龙氏刊本。

⑥ 《元朝秘史》卷四，额尔登泰、乌云达贵校勘《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4页。

⑦ 《校正元亲征录》第9页沈注，《知服斋丛书》本。

书之大病,读者不可不知。”<sup>①</sup>直到晚年,沈氏仍希望尽快得到蒙文原本,以便与汉译对照,更好地厘清全书。曾致书在日本的罗振玉说“内藤(湖南)处蒙文《蒙古源流》,曾许钞赠,此非旦夕间事,不审能假一阅否?三月为期归还,景迫桑榆,终思一读,以了余愿耳。”<sup>②</sup>

与同时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和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等比较起来,沈氏的校注更注重对相关史实的考实。张尔田即指出“为《秘史》作注者,以李芍农(文田)侍郎为最著,李书考订舆地,先生兼详史事。”<sup>③</sup>

如《元朝秘史》记年起于1201年(辛酉,鸡儿年),此前事迹确切年代多不可考。沈校则在这方面作了可贵努力。如推论帖木真(即成吉思汗)早期攻灭蔑儿乞惕部年代,说“蔑儿吉事要当在丙午(1186)前,知者太宗(窝阔台)崩于辛丑(1241),年五十六,则其生当为丙午。太宗有兄术赤,察阿歹(术赤弟)讥术赤是蔑儿吉带来的,是术赤生于孛儿帖(帖木真妻)被掳复归后也。假令孛儿帖夫人三年三乳,术赤之生亦当在甲辰(1184)以前,破蔑儿吉更先于此,不待言矣。译绎前后事语,破蔑儿吉至帖木真立国必不仅三年间事,容帖木真与札木合分背之后,更历岁时而后自立国也。”<sup>④</sup>《蒙古源流》谓帖木真与孛儿帖成婚在1178年,如此说可信,则术赤之生当在1178至1184年之间,而破蔑儿乞惕部年代自可依此而定。

《元朝秘史》等固然是现存最早和最有价值的蒙古史文献,但沈曾植并不盲从,对其中出现的记载矛盾和错误同样作了严谨的辨析。如《元朝秘史》载:1224年,术赤、察合歹、窝阔台兄弟三人攻克兀笼格城,“私分城廓、百姓,未出成吉思汗之分”,成吉思汗大怒,“时孛斡儿出(博尔术)、木合黎(木华黎)、失吉忽秃忽三人”劝其息怒。沈氏据《元史》指出“木华黎时已卒于中原,此所云殆有误。”又如1203年(猪儿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王罕开战,《元朝秘史》和《元亲征录》都说“成吉思汗既胜了王罕,见日已晚,收了军……那夜起著,离了厮杀处,宿下了。”沈氏认为“此战胜而实败,当夜起离厮杀处,是不能再战而夜遁也。”<sup>⑤</sup>揆诸当日情形,成吉思汗亲信博尔术险些被俘,其子窝阔台身受重伤,部众溃散,成吉思汗仅带十九人落荒而逃,兵败确系事实。

对于《蒙古源流》叙事中的不足,沈氏亦有所驳正,有的还对致误原因作了探讨。如该书记库克(即元定宗贵由)死后,窝阔台次子“库腾,丙寅年降生,岁次甲午(1234年),年二十九,即汗位”。沈注云“库腾即史阔端太子也,未尝即帝位,此之无稽可笑。”盖阔端自1235年后连年用兵今甘肃、青海、川陕一带,后出镇西凉,与西藏喇嘛教发生关系,因而被他们误认为大汗。萨囊彻辰取喇嘛书之说,致有此误。又如“此书叙太祖(成吉思汗)兄弟事,于哈撒儿多诬词。自明初漠北诸部与朵颜三卫不睦,此著书之彻辰乃外蒙人,承其余习故也。叙太祖伐夏时事,又于太祖多诬词,著书之喇嘛乃唐古特(西夏)人,怀其先世亡国之恨故也。至以明太祖为元之叛臣,成祖为(元)顺帝之子,野言仇口,腾说无稽。”<sup>⑥</sup>这些分析,都为读者了解该书写作过程和明代蒙古各部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在蒙元史研究中,还以其开阔的历史视野,对当时北方相关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分化离合关系作了探讨。

金元之际活动于内蒙古大青山以北的汪古部,因地处漠北和中原交通要冲,文化较发展,其族源一直颇引人关注。沈氏据阎复《高唐忠献王碑》指出:汪古源出回鹘,其首领则是沙陀突厥,“汪古、委兀一声之转。汪古之始祖曰卜固,即畏吾儿之始祖卜固可汗,此明证也。回鹘既衰,余部分散

① 《蒙古源流笺证》卷1,第1页,1932年沈氏《海日楼遗书》本。

② 《海日楼遗札》,《同声》第4卷第2期,第100页,1944年。

③ 张尔田《〈元秘史补注〉校记》。见《元秘史补注》,1945年《敬跻堂丛书》本。

④ 《元秘史补注》卷3,第8页。

⑤ 《元秘史补注》卷13,第7页;卷7,第2-3页。据《元史·太祖本纪》,木华黎死于1223年春。

⑥ 《蒙古源流笺证》卷4,第9页;卷3,第12页。

在交州<sup>①</sup>曰畏吾,在漠南曰汪古,此盖唐世九姓六州之遗人,其自称雁门节度使后者。欧阳元说畏吾以为地则高昌,人则回纥,汪古惕其部则回鹘,而主系沙陀欽。”<sup>②</sup>又金时北方的阻卜,沈曾植认为“或疑《金史》所称阻卜专谓塔塔里,非也。完颜襄与阻卜战,败之,追之斡里匝河,而塔塔里部长为太祖与王罕攻所杀,果阻卜专指塔塔里,则塔塔里自此亡矣,何以宗浩次年复与阻卜战乎?阻卜盖总众达达名,非止一部一姓也。”<sup>③</sup>此外,在辨析室韦部族名称的由来,考证乃蛮姓答鲁(或作“答禄”)氏和金与北边诸部族的关系等方面,也多有创获。

沈氏的考证,还为解决蒙元史上的某些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关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世系,以往史书记载多混沌不清,沈氏以《蒙古源流》与其他有关资料参证,指出“《藩部要略》:厄鲁特旧分四部,杜尔伯特姓绰罗斯,为元臣孛罕之后,孛罕六世孙曰额森。案孛罕不知何时人,以此书所载额森先世推之,额森之父托欢,托欢之父巴图拉,巴图拉之父浩海达裕,浩海达裕上溯孛罕仅隔一代,然则孛罕盖亦元季时人……御制《准噶尔纪略》:孛罕背正妻与他妇野合,生子曰乌林台巴鞞太师,其母弃之泽中,孛罕收养之,遂统部落。乌林台巴鞞太师为孛罕之子,又为准噶尔部祖,恐即浩海达裕父矣。《西域图志》准噶尔世系云:绰罗斯属,第一世为孛罕,元臣托欢后。自脱欢至孛罕,世次不可考。孛罕之子曰乌林台巴达台什,乌林台巴达台什子曰达耀,达耀子曰鄂尔鲁克诺颜,鄂尔鲁克诺颜子曰巴图兰青森,巴图兰青森子曰额森诺颜……图志之达耀,即此之浩海达裕也。”<sup>④</sup>这就基本厘清了孛罕至额森(即明代瓦拉贵族首领也先)的准噶尔部世系,并为目前学术界所采纳。<sup>⑤</sup>

自然,作为《蒙古源流》的首部校注,也存在一些不足处。如有些地方注释前后不一,有些则是疏忽。如卷七中误将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与俺答汗之子黄台吉(后受明封为顺义王,改名乞庆哈)当作一人;卷六记达延汗“以乌鲁斯博罗特授为右翼三万人之济农(明代蒙古‘亲王’的译音,又作‘吉能’、‘吉囊’),

令郭尔罗斯之巴巴岱乌尔鲁克随往,称为阿巴海。”详后文意,“阿巴海”应指乌鲁斯博罗特,沈氏却误以为是后者,并作了牵强的解释。但即使如此,他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仍不可没。

## 二、勇于拓新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地理研究

沈曾植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精神上固然是对道咸以来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的继承,内容却并不以此为限,而是注重依据时局变化或新材料的发现,对该领域的研究作了不少拓展。

沈氏治学,素重创新,由其首开风气校注的西北史地典籍不下十余种,惜正式刊行者不多,在致罗振玉的信中,他对此作了解释“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sup>⑥</sup>这既可知他对著述的谨慎态度,也表明了对学术创新这一原则的高度重视。王国维论其学术“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孙仲老(指孙诒让)辈则笃守古法,无甚出入矣。”<sup>⑦</sup>也点出了其学术的这一特征。正因沈氏敢于突破前人旧说,常使他在传统典籍的研究中获得可喜的新发现。

① 此交州,冯承钧以为即火州(参见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77页)。火州,一作和州,高昌回鹘都城,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堡西南。

② 《元秘史补注》卷8,第3页。关于汪古部族源,近代以来中日学者有鞑靼说、突厥说、羌族说、沙陀说和回鹘说等,迄未统一。

③ 《元秘史补注》卷4,第7页。

④ 《蒙古源流笺证》卷5,第4页。

⑤ 如高文德、蔡志纯编著的《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孛罕诸子世系”部分就采此说)。

⑥ 沈曾植《致罗振玉》,《海日楼遗札》,见《同声》第4卷第2号,第96页,1944年。

⑦ 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12.24),《王国维全集》卷15,第253页。

如长久以来,提到汉代匈奴单于庭,往往只及漠北龙庭。同时的丁谦在《匈奴传考证》所附《漠北建庭考》中就仅谈到漠北龙庭。沈则指出,其实还应有漠南龙庭,亦即《汉书·李陵传》所谓“故龙城”:“单于建庭之所为龙城,自元封以前,单于庭在幕南,直代、云中;元封以后单于庭在幕北,直云中西、酒泉东。此故龙城,谓幕南之旧庭,其道盖自浚稽而东南,指五原、定襄之间。若居延乃故时右部之地,右贤王所居,安得有龙城乎?”<sup>①</sup>

又如元代所遗《元经世大典地图》,前人多不甚重视,魏源将张穆所获《永乐大典》本“大典图”刊入《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因其“开方无里数,而西北正位反处四隅,皆使人疑惑”<sup>②</sup>而感到不可解。洪钧称此图乃元至顺元年(1330)三月元廷赴西北诸王燕只吉台(察合台系后王)、不赛因(伊利汗国旭烈兀系后王,1317-1335年在位)、月即伯(即月祖伯,钦察汗国术赤系后王,1312-1342年在位)等处使臣“驰驱咨度”所得,<sup>③</sup>然并为解释其绘法特殊之原因。沈曾植认为“以《元史》地[理志]、《明史》、邱处机、刘郁、陈诚所记验之,地名方位往往合符,知此图实可依据。”并分析此图的来源说“元代地图多出西域,据‘河源附录’,知朱思本之图本于帝师家之梵字图书,而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言圣朝据西番经,名真腊曰激浦只(今柬埔寨)。所谓西番经者,殆亦图经之类,是朝廷诏命且用之。大典之图,北不及海都(窝阔台之孙)所封,东尽沙洲,西北月祖伯封地阔略,而独详于回回故地笃来帖木儿(察合台系后王)、不赛因二人所封,其必为回回人所绘无疑也。”他分析,大典图绘法特殊,当是出自西域回回人手之故,它原来很可能绘有南北向的“天度斜线”(经线)和直格,传入中土后,“摹者不解其意,留直而去斜,不解南北易向之由,仍存其四隅之旧识,据直格以观斜线之向,又不能得斜线之中线果在何方,则其回易迷紊,端绪不可寻,固所宜矣。”<sup>④</sup>考元修《一统志》,曾令各行省进呈本省地图及图说,其中可能也包括一些西北地区的宗藩国图。当时秘书监有一奏折说“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却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sup>⑤</sup>此“回回图子”当指伊利汗国地图。此外,参与《元经世大典》编修的著名大食学者瞻思曾著《西国图经》,将波斯、阿拉伯的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见元代确有回回人所作地图及其地图学知识传入。可惜瞻思之书早佚,也不见当时元廷的西域地图保留下来。沈氏的见解无疑为探究这一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

其对《穆天子传》的研究,同样反映出这一特点。穆传为西晋发现的汲冢书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视为小说不经之谈,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至斥为东汉以后人杂取《左传》、《史记》和《山海经》之说的伪作。沈曾植不以为然,在《穆天子传书后》中,他认为“《穆天子传》多古文奇字,多阙字……意其柏夭说之,造父、祭父受之,太史书之而藏之者耶?明其义例,则此书与《禹贡》可相发,不为荒诞也。”并尝试对传说中穆王西征的地理方位作了测定,谓其“第四卷末里西土之数,固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周尺短于后代,所谓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固当以里法折减算之。大旷原盖当今里海、咸海间之大沙漠,迤北以至乌拉山东吉里吉思高原。昆仑之丘、西王母之邦在其东,当今葱岭东西、葱岭南北新疆内外诸回部。西夏氏邦次东,当今青海。河宗又在其东,则今宁夏迤及河套诸部矣。”对穆王西征具体路线的考证,沈氏仍沿晋郭璞说,以为系由晋漳水北循滹沱,入河套而西,这一点,近人已有异议。

① 见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页。据黄文弼《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认为漠南单于庭在阴山附近,见《匈奴史论文选集》,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印本。

② 见《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2“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附元经世大典图并说”。又“开方记里”为西晋裴秀所创地图绘法。其法为按比例将整个地图划为大小一致的若干方格,方格每边代表地面若干长度,以便按格数多少计算距离。今存《元经世大典地图》虽画有方格而无里数比例,故谓其“开方无里数”。

③ 洪钧《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见《同声》第3卷第2期,1943年。

④ 沈曾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7-178页。

⑤ [元]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在他看来,周穆王西征的真意是在安抚西北诸部,其“经略西域方略与汉人用意略同”。故该书对考察古代北方诸民族居地的变化有很高史料价值,如其所记“西夏盖即《王会》大夏之西部所居,盖汉以前月氏故地,此书无月氏。”<sup>①</sup>伊尹‘献令’,大夏、月氏皆在正北方。<sup>②</sup>其后积渐西涉,得非为月氏所逼欤。匈奴、月氏、大夏皆北方种族,蹶迹西徙,大夏开其先,月氏继之,而后匈奴继之,独此书记大夏未入西域以前故地,此为地理学者最可宝贵之典证已。”并提出“书中尤可注意者,‘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是积石之西有殷民。‘赤乌氏先出自周宗’,是春山有周民。西夏、大夏不见《禹贡》、《夏书》,而见于《商书》、《周书》,皆与匈奴相次。匈奴且为夏后氏裔,则大夏、西夏之为夏民,岂待言哉。”<sup>③</sup>这些,都发前人所未发,给后继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

与此同时,在提倡和运用新发现资料开展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沈曾植亦颇具特识,其中尤以对“和林三唐碑”的研究具代表性。

1889年,以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为首的俄国考古队在外蒙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阙特勤碑和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也在次年发现。因三碑均作于唐代,并发现于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地区,故国内学者称之为“和林三唐碑”。它们的发现曾在当时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893年后,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和俄国拉特洛夫(W. W. Radloff)相继对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的突厥文部分取得研究成果。同年,俄国驻华公使将拉特洛夫《蒙古古物图志》中刊出的三碑影印本送清总理衙门,属为考证,时正在总理衙门兼职的沈氏遂结合新、旧《唐书》相关记载,对其汉文部分作了详细研究。

三碑历经岁月沧桑,多断裂残缺。沈氏以深厚的史地修养,对其来历作了说明。其中苾伽可汗碑碑名已泐去,经参证相关史籍记载,他指出:土人“称此碑为莫纪邻王陵碑,莫纪邻即默棘连,亦作默矩……所以知为苾伽碑者,第籍首行撰人衔名及文末‘使侄立庙’云云,与《唐书》默棘连死,‘帝为发哀,使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史官李融文其碑’相证合耳。”<sup>④</sup>

通过碑文证史,他纠正了传统史籍的一些误记。如据阙特勤碑知新旧《唐书》所谓“阙特勒”实“阙特勤”之误,进而指出“突厥语无可考,而蒙古口语,历久相沿,可敦之为哈屯,达干之为答尔罕,叶护之为详稳,为桑昆为想昆,旧语班班可相证合。然则言之所谓特勤,即《元史》之斤,亦即今蒙语所谓台吉矣。”<sup>⑤</sup>又如苾伽可汗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新旧《唐书》失载,沈曾植以为“此可补阙者。新书称苾伽子嗣位者,先伊难,后登利。《唐会要》:‘开元二十二年,毗伽为其臣梅录啜毒死,子登利立。’据文末称‘利可汗,虔承遗训’,明指登利言之,则与《会要》相证明,又可纠新书之误者矣。”并指出苾伽可汗与阙特勤兄弟“始终亲唐,靡有异意。明皇结以父子,恩逮存亡,册命荣,玺书褒德,凡诸诏令,与碑文词意大同。摩挲残石,可以想见当时抚御微权也。”<sup>⑥</sup>以致两人死后,唐玄宗都亲书碑文,以示恩宠,特别是阙特勤,还为之“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人以为未尝有。”<sup>⑦</sup>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双方奉行民族和睦政策的成功。

三碑中,以九姓回鹘可汗碑损坏最甚,“碑文残缺,文无首尾,亦无年号岁月,不能知为何时所立,以文中所述诸汗事迹考之,当在贞元中。”尽管如此,沈氏还是据所见到的前三段及七、八两段断碑印本,征引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文献,钩稽史实,考释回鹘历史及其与唐之关系,并从中搜寻新的史迹,如谓“史言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入贡,大历后浸微,臣服葛禄。据此碑,

① 王国维以为《穆天子传》中“禺知”即后来史书所载之“月氏”,见氏著《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

② 认为据《逸周书·王会解五十九》“伊尹朝献商书”一节文字,知当时大夏、月氏居地尚在正北方而非西北。

③ 上引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皆见《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0-172页。

④ 沈曾植《突厥苾伽可汗碑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年第2期,第234-235页。

⑤ 沈曾植《阙特勤碑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年第2期,第233页。

⑥ 沈曾植《突厥苾伽可汗碑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年第2期,第235页。

⑦ 沈曾植《阙特勤碑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年第2期,第233页。

则贞元末黑姓尚有可汗,与葛禄并峙,国未亡也。十箭为西突厥之遗民,

三姓亦突骑施之部落。史称开元中以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与碑语可相证发。”<sup>①</sup>

据王国维说,沈曾植有关三碑的考证,曾被“俄人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称引其说”,<sup>②</sup>可见一时影响之大。

不仅如此,沈曾植还是清季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研究开拓者之一。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上,他曾作有《蛮书校注》,稿虽未刊,但仍能从其《蛮书校注跋》中略窥梗概。唐樊绰所作《蛮书》十卷,是记载古代云南地理的重要著作,对唐朝云南的交通途程、山川城镇、风土物产、边疆民族生活和军政制度等都有系统描述。沈的跋文,对其时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和一些历史地名作了考察辨析,新意迭出。如指出唐时南诏国主所以自称“骠信苴”,盖因骠为其属国之故,“据贞元中南诏朝贡挟骠使以俱来,而寻阁劝自称骠信苴,‘信苴’,蛮语为‘主’,则寻阁劝自以为兼王骠国也。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夸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并对其地明以前的疆域变迁作了探讨:“(元)史地志叙金齿以西土蛮八种,云异牟寻尽破群蛮,徙其民而取其地,南至青石山,与缅为界。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渐盛,蒙氏安西、开南城戍,殆皆废弃于是时。然其地为南诏旧域,十一总管固知之,故元世建茶罕章以统滇之西边,其戎索当及阿萨密;建八路以统南边,其戎索包有北缅怒江以西诸部之地,几尽得蒙氏旧疆,非若明人画于麓川而止也。”<sup>③</sup>揭示出南诏全盛时,其疆域一度包有骠国(在今缅甸)旧地及其对元代在滇、北缅地区设立行政机构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沈氏还指出了《新唐书》的疏漏处:“‘骠信苴’三字连文,新史删去‘苴’字,非也。《续文献通考》:‘元既灭段氏,得五城八府三十七蛮郡之地,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孙,世守其土,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第一代曰信苴段实,二代曰信苴段忠,三代曰信苴段庆……十一代曰信苴段明。’总管世世称‘信苴’,可知夷语所谓君者,是信苴,非骠信也。”<sup>④</sup>由此可见,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依《新唐书》“骠信,夷语君也”之说,将“异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中的“苴蒙阁劝”标为名字,<sup>⑤</sup>显然值得推敲。考《新唐书·南蛮传》:南诏“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sup>⑥</sup>如细奴逻子为逻盛炎,逻盛炎子为炎阁,炎阁嗣子为阁罗凤,阁罗凤子为凤迦异,凤迦异子为异牟寻,异牟寻子为寻阁劝,因姓蒙,《旧唐书》又称“蒙阁劝”,而不应作“苴蒙阁劝”。

在南海交通史等研究方面,沈氏除刊有《岛夷志略广证》外,还作有《佛国记校注》和《诸蕃志注》,惜未刊,仅于《海日楼札丛》中得见考证若干条。

《岛夷志略》为元汪大渊游历南洋的实地记录,为考察当时南洋各地风土人情和古代南海航路的难得第一手资料,只是记载略显凌乱,存在地名方位不明和华译地名多杂闽赣方言等缺点。为便于阅读,沈曾植据当时出版的中西地图及史书、笔记等资料,对南亚、非洲许多古地名如丁家庐、丹马令、彭坑、麻啰华、层摇罗(沈氏以为“摇”乃“拔”之误)等作了考释。并提出“凡印度西南城邑往往犹存古名,以土人种类不改,故地名亦多不改。”而在“暹、缅海崎,自古市舶辐辏之区,其土盖多古国”至于西方殖民势力东侵后在南洋各地的“开

埠之地,大都皆古来都会也。”<sup>⑦</sup>由于沈氏所处的时代,我国的南海交通史研究尚处于资料收集

① 沈曾植《唐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年第2期,第236、238页。

② 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王国维全集》卷8,第500页。

③ 沈曾植《樊绰蛮书校本跋》,《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一)》,《文献》1991年第3期,第172、173-174页。

④ 见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页。

⑤ 见《旧唐书》卷197,中华书局本,第5284页。

⑥ 见《新唐书》卷222,中华书局本,第6281、6270页。

⑦ 见《岛夷志略广证》第三卷,丁家庐、班达里条,1912年《古学汇刊》本。

整理阶段,囿于见闻,其对不少古地名的疏解,今天看来未必精当,但其中亦不乏通达的见解。稍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岛夷志略校注》就从沈注中获益不少。如沈曾植据《明史·爪哇传》和《续献通考》释古代马六甲海峡重要泊船处“班卒”说“班卒既与龙牙门后山相连,览邦据针路又近石旦,即图志之巽他海峡,则班卒必为满刺甲至下港中间泊所,盖无疑也。”藤田丰八据以考出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岛西岸之巴鲁斯(Barus)近处。又如沈曾指出“苏门傍”在今暹地(今泰国),藤田丰八以为然,并据以进一步考定为“苏门阜”,《明史稿》作苏门邦,殆Suvama-Puri之对音。<sup>①</sup>

南海古代地理交通的研究,是近代史学领域新兴学科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分支。它的兴起,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急于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也是西北史地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沈氏无疑是一位值得重视的拓荒者。

### 三、从沈曾植的西北史地学看清末民初的学术变局

整个晚清学术的变局,是以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发轫的。这一潮流的涌动,不仅重新激发起今文经学的活力,也促使一批学者走出单纯考据之路,开始自觉追求清初顾炎武等考证学的精神境界,徐松、张穆、何秋涛和沈垚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沈曾植的西北史地研究,正是对该派传统的继承。

如1880年,正当曾纪泽赴俄谈判修约引起朝野瞩目之际,沈氏在参与会试的第五策“答问北徼事”中,钩稽诸史,历考汉唐元以来西北边疆沿革和中央朝廷对该地区的行政管辖制度。<sup>②</sup>中法战争时期,他又考证了历史上云南通安南(今越南)的水道,谓法国人所称之“红水河路”,“世言此道开自元人,不知伏波(东汉马援)已尝言此矣。然后世皆由陆路,而伏波议从水道,以知此江实可通舟。中国人不能通古今水道,遂使胡人先我著鞭,可叹也。”<sup>③</sup>这类考证,看似谈学术,其实都带有对时事的关怀意识。应当说,这也是促使他此期学术上倾向进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前后,沈的思想经历了一番风云跌宕的起伏。作为翁同龢系的“帝党”京官,他一度政治上倾向维新改良,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并积极参与组织强学会。1898年3月,他丁忧扶柩南下之际,目睹维新思潮日趋高涨的同时,清廷内部新旧势力的冲突却在不断加剧,预见一场政治争斗已不可避免,不免忧心忡忡。谓“中朝党论,疑忌方多,病状益深”,<sup>④</sup>变法前途莫测,深恐康有为举事轻躁而致败,临行前特致以短函,劝其一读《唐顺宗实录》,<sup>⑤</sup>注意吸取唐王叔文等“永贞革新”失败的教训。变法失败后,当他得知刑部同僚刘光第不幸罹难,不禁悲从中来,作《野哭》诗五首哀之,其四云“草草投东市,冥冥望北辰。并无书牍语,虚怀解环人。天地微生苦,山河未劫真。一哀终断绝,千古为辛酸。”并为刘之被杀鸣冤,称“烈士宁忘死,难甘此日名”,“精爽虹应贯,虚无狱会明”。<sup>⑥</sup>由于此时翁同龢先已开缺回籍,其余“帝党”人士亦各自散去。他本人则应张之洞聘,在

① 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苏门傍》,《雪堂丛刻》本。按:苏门傍约当今泰国犹地亚西北的苏勿武里(Suphan-Buri)一带,一说在印尼爪哇岛以东的马都拉岛。

② 文见王遽常编《沈寐叟年谱》,第16-17页。

③ 见《海日楼札丛》,第126页。案:此语原见沈曾植《护德瓶斋涉笔》,作者自云“此壬午(1882)、癸未(1883)之间所记,亦有续添者,大抵在京邸时。”是知其发于中法战争前后。

④ 王遽常编《沈寐叟年谱》,第32页。

⑤ 沈曾植卒,康有为有挽诗云“万言书既上,请师日德俄,德庙大感奋,雷动挥天戈。维新救中国,扫荡旧白科。公又遗短书,半简字无多。《唐顺宗实录》,请吾读一过。盖公料事变,忧我蒙网罗。”见《沈寐叟年谱》1898年条。

⑥ 见钱仲联编注《海日楼诗注》(稿本)卷2,诗后钱氏有按语云“此诗盖哭刘光第者,公与光第刑部同官也。”

其幕下任事<sup>①</sup>政治上遂日益靠向以张为代表的后期洋务派。在他看来,“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疾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戊戌之败,本原在此。以今日国势言之,譬之病后形神尪瘠,而又欲治其痼疽。痼疽不免刺割,刺割不免痛楚……贸然以毒剂腐药进,则病未愈,而宛转号叫以毙者不知凡几矣。官府积弊,官吏积习,大痼疽也;变法,大刺割也。事失故业,官失定位,旧德亡,先畴改,隐心以言之,不得谓非天下一大痛楚也。故尝谓开新与守旧二说,不必并提。兴利与除弊两事,不可并进。新既开,不忧旧不去。利既兴,不忧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器器然日以詬詈之声闻天下,人愿其情,而争心并起,则无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这是他对戊戌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他认为改良图新之道固不可弃,但举事应缓而稳,其法在于反复酝酿,征得新旧各派的共识,然后方可议行。甚至说“勇变政者,才士也;惮变法者,不可谓非国家服教畏神、奉公守法之良士也。新政究非王道,异趣者又不可曰邪人……不得已而思调剂之,莫若仍守差遣、员缺之常,以差遣任新人,以员缺安旧人,新者有显荣之实,旧者不必靳其廉退之名。但使一切皆有章程,彼旧者何必不乐奉周旋?”<sup>②</sup>指望在不损及旧势力的条件下推行某些新政,以减少阻力。可见经此事变后,沈的革新观已变得相当迂缓拘谨。辛亥革命后,沈曾植成为著名的亡清遗老,1917年更参与张勋复辟,政治上已完全堕为时代的落伍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氏此期的学术却并未与其政治上的落伍完全形成同步,而是依然表现出一种关注新材料和新问题的积极“预流”姿态。这一点,与罗振玉、王国维堪称同调。个中原因,颇值得探讨。

如前所说,沈曾植前期的活动,基本上可归入晚清经世学者的阵营。当维新思潮兴起之际,他确曾真心倾向过政治改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自非一般头脑闭塞之旧文人可比——即使与康、梁不属同一层次,至少也是接近“立宪派”一流的。而从学术上看,他一向关注的西北史地学,原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即从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个西北边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包括西北、西南陆路和南海交通史)和中亚西亚一带的古地理、民族和语言等研究。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既与近代以来国家边防和外交危机的刺激有关,也是日趋兴盛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冲击的结果。沈氏从1890年起,长期在清总理衙门兼职,不仅与外交事务多所接触,对国外学术信息的了解也较常人为多,故得以较早获得“和林三唐碑”印本,并通过外交使节洪钧等知悉国外蒙古史研究的某些状况。以后,又与东西方汉学家内藤湖南、藤田丰八、伯希和等相交往,对该领域的前沿渐有所把握,以致很早就产生了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并“参证吾国史书”,以研究成果“贡诸世界”愿望,并为此搜罗了不少俄、日文书籍。<sup>③</sup>加之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蒙古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问,本来就是较早注意利用国外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一个领域,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不能不对沈氏的学术眼光产生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

这种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养成的比较开放和开阔的视野,使其对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往往保持着相当的敏感,以致在晚年政治思想落伍时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1911年初,当国内不少学者仍对出土甲骨文抱怀疑态度时,他读竟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即驰书于罗,谓“大著三篇,尽

① 1898年6月,沈曾植应张之洞聘,出主武昌两湖书院史席。9月,一度应湖南巡抚陈宝箴聘,主讲湖南校经书院(见嘉兴博物馆藏《敦请沈子培主讲湖南校经书院兼总理学会关书》)。旋因政变作辞馆返鄂。今嘉兴博物馆犹存当时陈宝箴致沈曾植手函,其中谈到“返署接节庵(梁鼎芬)电稿,刘(光第)、杨(锐)平安,喜极。惟康(有为)、超(梁启超)为洋船接去等语。杨、刘既平安,大抵只查抄,无交私之件,便不问耳。似此,当不至兴钩党之狱矣。”(见该馆藏《海日楼藏手翰集》)事后方知,梁误传消息,刘、杨与谭嗣同等六君子同被杀。

② 沈曾植《与南皮制军书》,见《沈寐叟年谱》,第41-46页。

③ 据文载道《谈海日楼》一文报道,沈去世后,人们在他的藏书中发现“除汉、日文外,于俄文亦略盈篋”。见《古今》第38期。

一日夜之力竟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金石学家忽腾异彩。公自今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矣,可贺可贺……安阳甲骨拓本,亟愿得之,多多益善,公所藏能应我求否?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示,此事让公先著鞭。读公书,欷且妒也。赏析之欢,京外殆无第二处。”后得知罗振玉拟撰《殷虚书契后编》,又致函深表关切,谓“《书契后编》于吾国文明史上发一殊彩,亟思快睹,不知出书时能见示一部乎?”<sup>①</sup>对于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物,他同样十分看重其价值,特致函罗振玉谓“英法敦煌古物,此亦吾国文明资料,必不可不设法者,然必非私人人力资格所能胜,已作书告汪伯唐(大燮),如何办法,需款若干,公能行否,请详细规划,作一文见告为盼。余年无几,即如愿亦未必能观成,姑作此百年调,亦妄心之未退者也。”<sup>②</sup>并高度评价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对该领域研究所做的开创性贡献,称赞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云“即此戈戈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鹭静安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sup>③</sup>对罗、王两人合著的《流沙坠简》,尤表欣赏。

上述现象表明,人文学术与政治虽存在着相当关系,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盖其发展的内在要素和机理并非同构,落实到具体个人,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清末民初学术界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身上这种学术前沿性与政治保守观并存造成的明显反差,自然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动荡有关,但由此也提醒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沈曾植的治学方法,同样带有清末民初学术变局的时代交替痕迹。他的学术,主要自然是对乾嘉特别是道咸间张、何、沈等考据学的继承。这突出地反映在其对传统音韵训诂和校勘等朴学方法的熟练运用上。这点,在前文已有相当反映,这里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典型的例证。沈氏对音韵学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说他“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sup>④</sup>在西北地理研究中,不少资料的阅读运用存在因古代语言转译造成的疑难。在不懂外文或古代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对音法确给他的史实考证提供了很大帮助。如《续文献通考》记明代蒙古地方元裔部落分布情况时提到“东有罔留、罕哈、尔噶三部”,与《明史》及《蒙古源流》有异。沈氏详审其读音,指出“东方之罔留三部即明人所谓‘三卫’。《武备志》:鞑靼译语泰宁卫曰往流,福余卫曰我著,朵颜卫曰五两暗。罔留者,往流之对音,即泰宁之蒙语。罕哈者,即五两暗,为兀良哈之对音;尔噶者,我著之对音,即朵颜、福余之蒙语也……明人统三卫皆谓之兀良哈,而中分三种,此则他书所不详。”<sup>⑤</sup>类似的考证,在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名、族名、人名辨析时颇多,虽不必都中,仍给读者很大的启发。

在运用校勘学整理史地文献方面,沈氏更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些发现,迄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如《诸蕃志》中有“中理”一条,叙事过简,为书中最短条目。且“中理”作为国名,不仅未见同书他条涉及,亦不见他书记载,历来注家多疑其有脱文,却不得其解。沈氏运用他校和理校之法,通过核对《事林广记》有关记载,提出此“中理”一条原书本无,乃从书中“勿拔”条误分而来,故应削去“中理”一目,将此两字紧接前条正文,以恢复原书面貌,说“《事林广记》录‘勿拔’事,乳香、飞禽、打鱼、龙涎大略相同,前‘大食’国条中,‘勿拔’直接‘嚮蛮’,亦无‘中理’之目。盖抄胥误析一国为二条。当削去‘中理’国,以‘为事理’为句乃合。”<sup>⑥</sup>这条校语为解决此疑案提供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意见,值得今人参考。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沈曾植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虽具有相当浓厚的传统色彩,但也开始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如《元朝秘史》记蒙古族祖先为狼鹿相配而生,对此,沈氏认为“狼鹿相配,

① 沈曾植《致罗振玉》,见《海日楼遗札》,《同声》第4卷第2号。

② 沈曾植《致罗振玉》,见《海日楼遗札》,《同声》第4卷第2号,第96、93-94页。

③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④ 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8.10),《王国维全集》卷15,第325页。

⑤ 见《蒙古源流笺证》卷6,第17页。

⑥ 见《海日楼札丛》,第117页。

蒙古后人亦自讳之,故《蒙古源流》不用此说也。俞浩谓蒙古本唐世室韦蒙瓦部种族,当属东胡。今据狼种推之,又当与突厥高车同种矣。域内之国各有所尊,中国尊龙,天竺尊牛,北狄尊狼,皆非俚虫之类,各以所敬畏者为神明,因尊所以敬畏之人为神明之胤,北俗言狼种,正当犹中国龙种耳。此嗤鄙隐讳均陋识也。”<sup>①</sup>这种看法,显然已受到近代民族学有关原始部落氏族图腾制学说的影响。

又如在解释《圣武亲征录》中“拜答刺边只儿”地名时,沈氏联系沙漠地带的自然变化现象说:“蒙古语河身曰别竭儿,《三史语译》改巴齐儿。此‘边只儿’《秘史》作巴勒赤儿,即别竭儿、巴齐儿之异文也。漠北之河时涨涸,故有拜答刺河身之称。又案‘拜答刺’,《秘史》作巴亦答刺,今拜达里克河。”<sup>②</sup>在《岛夷志略广证》“北溜”的考证中,他还注意从海洋季风、水流方向变化去分析古代海舟航经地和泊船处。这里,已多少反映出其自觉运用有限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考察地理现象的用意。

此外,在研究中,沈氏还试图用语言比较的方法去探求古代民族族源。如指出,蒙语与东胡后裔鲜卑族语的关系密切“《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云云。以《至元译语》证之,胡洛真即蒙语出军人曰巢刺赤之‘巢刺赤’;乞万真即蒙语通事曰乞里马赤之‘乞里马赤’;守门人曰可薄真,即蒙语把门曰匣儿甲赤之‘匣儿甲赤’;诸州乘驿人曰咸真,即蒙语使臣曰宴赤之‘宴赤’。惟台使为拂竹真,与蒙语谓宣差为‘达鲁花赤’不合……准此推之,鲜卑语殆与蒙古语相去无几。”<sup>③</sup>关于蒙古族源问题,目前争论尚多,但多数学者认为与鲜卑等东胡民族关系较密,其依据正是通过对其历史活动区域和语言比较方法来求得的。

自然,沈曾植运用对音等方法对古代中外地名和人名史迹的考证不免存在一些误判,其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观念治史亦处于较浅的层次。但如果将他的学术放到整个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初期形态去看待,对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便能多一份同情与理解了。

沈曾植的知识渊博和学术精湛,年轻时已得到诸多名家如李慈铭、李文田、洪钧、文廷式、张之洞的推崇。进入民国后,由于同辈学者大多去世,使之一度成为清学硕果仅存的“鲁殿灵光”式的人物,受到东西学者的瞩目。王国维至称其不但精于经史,且“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不及……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sup>④</sup>

王氏本人治学,就曾得益于沈。其《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即因沈的启发写成。至其后期的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也与受到沈的影响有关。还在1914年,沈氏就在致罗振玉的函中向王建议“静庵故尚有意乎?若条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尔后王之世系,若月支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故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sup>⑤</sup>王国维随即复函称“大抵吾国史籍可得与外国史书参证者,惟元代以后确有大补益处,隋唐以前裨补实少……如匈奴与大月氏分布西域情形,西人议论虽多,恐不过据吾国史书上数语与近来所得地理上、古物上之材料,以声音相比附而已。此外根本材料亦复不多。先生半生探索,必有精思卓说足以指导世界。”并表示“国维于西域史事,隋唐以后实未研习,其于西人之说亦未尝寓目。兹事体

① 沈曾植《元秘史补注》卷1,第1页。

② 见《校正元亲征录》,《知服斋丛书》本,第23页。

③ 见《海日楼札丛》,第98页。

④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卷8《观堂集林》,第619-620页。

⑤ 沈曾植《致罗振玉》,见《海日楼遗札》,《同声》第4卷第2号,第96页。

大,未敢引为已任。惟写官之役,所不敢辞。”<sup>①</sup>这些话,虽态度谦抑,却已表露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之意。1916年归国后,居于沪上,与沈氏过从甚密,曾手抄其所撰《穆天子传书后》与《和林三唐碑跋》,<sup>②</sup>细加研读。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和《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等。其中《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作于1925年冬,认为月氏即《穆天子传》中之“禺知”,其部周末居雁门之北、黄河之东,秦汉间居敦煌祁连间。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为匈奴所败,乃西居且末、于阗间,后复西击大夏而臣之。这些看法,显然是对沈氏《穆天子传书后》的进一步发挥。1979年,徐中舒发表《夏史初曙》一文,继续对此有所探索,基本认可沈、王的看法,认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幸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一个方向逃亡……秦始皇琅邪刻石说秦王朝疆域‘北过大夏’(《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北过大夏’)这是秦时大夏尚留居中国北方最有力的说明,而这里也正是匈奴之所在。西虞也

是有虞氏由中国北境西迁以后之称。”并指出,《穆传》之“禺知”即月氏,实为古代有虞氏以后。<sup>③</sup>足见沈说影响之深远。

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中对穆王西征路线的探究,对后人也有相当启迪。当代史家岑仲勉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即引沈文中的相关观点,以为“去事实不远”。并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说“整个《穆传》的地理比定,外人未有尝试,我国学者则说各不同,就中以沈曾植吉里吉思高原说为最稳,惜语过简略。此篇通过古今地之比定,证明沈说大致不错。”<sup>④</sup>

如此看来,沈曾植的史学,不但在我国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上具有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也反映出清末民初学术变局的某些时代趋势和特点。这正是我们讨论其史学的学术史意义所在。

① 王国维《致沈曾植书》,《王国维全集》卷15,第68-69页。

② 王国维1919年抄校本今犹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③ 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④ 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从该文看,岑氏似未见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原文,其引文系转自张鹏一《阿母河记》所引。

## Shen Cengzhi and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 Fengxiang

**[Abstrac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ademic fields in modern Chin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academic tradition, Shen Cengzhi has made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Mongolia,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His academic ideas and methods both show his concerns about the frontier crisis and reflect the trend of exchange between the domestic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entalism.

**[Key words]** Shen Cengzhi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 applied academics

(责任编辑 周文玖)